

袁志刚 万广华 / 主编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eveloping Nations

发展中^大国的竞争

——中国和印度谁将胜出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985工程”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之一

袁志刚 万广华/主编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eveloping Nations

发展中大国的竞争

——中国和印度谁将胜出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中大国的竞争:中国和印度谁将胜出/袁志刚,万广华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309-06426-1

I. 发… II. ①袁…②万… III. ①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②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印度 IV. F120.4 F1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982 号

发展中大国的竞争——中国和印度谁将胜出

袁志刚 万广华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鲍雯妍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47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6426-1/F·1456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2007年6月7日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七个发达国家加上俄罗斯的首脑聚首德国后发表了一份长达37页的共同声明,该份声明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一个词就是“新兴经济体”。所谓新兴经济体指的就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正在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和印度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极为耀眼的两颗明星。1980年,发展中国家总产值只占世界总产值份额的五分之一,而到2005年,该比重达到三分之一。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印两国的平均收入增长分别为9%和4%,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7.5%。由于这两个国家良好的经济表现,使得世界上有4.5亿人口脱离贫困,其经济成就可谓十分巨大。

20世纪中叶,随着二战的结束,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殖民者手中纷纷独立出来,寻求富民强国的道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也开始思考发展中国家如何走上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经济增长的辉煌之路。但是,平心而论,发展经济学并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多少有益的指导。相反,在实践中亚洲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等,从外向型经济起步,在一段时间内使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创造了所谓“亚洲奇迹”。但是,一方面由于它们的经济体量太小,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关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如何使产业结构向更高阶段发展,使经济增长更加持续和更加有质量的命题,尚在探索之中。“亚洲奇迹”还有待于更长的时间来检验和总结。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和始于1990年的印度经济的转型和发展,由于两国的经济体量之大,人口之众,情况之复杂,经济成就之显著,都使任何发展经济学理论为之惭愧,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怎样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收集的论文主要是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于2007年1月12日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南部引擎——中国、印度、巴西及南非”学

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作者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多为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或世界经济的专家。根据论文的内容，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的崛起：改革和开放的推进；（二）发展的经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三）大国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成长；（四）大国的角色：中国和印度的未来。

本书第一部分：“中国的崛起：改革和开放的推进”由四篇论文构成。姚树洁教授等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视角》提出并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生产效率提高的推动力量，使中国的实际生产能力不断向潜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2）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技术和知识，使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上述两者的共同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宋立刚教授等的论文《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成分分析法》将中国的改革分为：城市化、工业结构的转变、产权改革、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和财政系统改革等五个方面，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不同的改革项目进行评估，发现城市化对经济效率改进的贡献最大。蔡昉教授的《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从人口红利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人口红利可以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资本积累的增加，从而加速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生活水平提高所导致的人均寿命延长，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的威胁，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几十年中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新的转变，其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加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英国牛津大学 John Knight 教授的《中国、南非和 Lewis 模型》一文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剩余的国家如何通过劳动力流动，使劳动的边际产出得到增加，同时也分析了其流动的结果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南非在历史上是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但是在近年却变成了一个劳动剩余的国家，中国案例与南非案例的比较让我们获得某些启示。

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发展的经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由四篇论文构成。Pranab Kumar Das 等教授的论文《金融发展与中印经济增长：一些思考》比较了金融发展对中印两国经济的不同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较高的资本积累，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带动金融发展，而金融部门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是滞后的。相反，印度经济中金融部门的发展是领先于实体经济的，因而对实体经济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张晏博士

和印度学者 Pinaki Chakraborty 的论文《经济改革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支出：来自中国与印度的证据》基于中国和印度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一事实，分别论述两国财政在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支出方面的差异。吴延瑞教授的《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趋同：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一文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印两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进行了考察，提出在目前两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否收敛的思考，对中印经济的增长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银行 Mannizio Bussolo 等学者的论文《全球增长和收入分配：中国、印度，世界的重塑者？》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发展的世界收入分配动态分析模型(GIDD)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了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预言随着中印两国人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一个全球中产阶级必将形成。

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是“大国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成长”，由两篇论文构成。Rhys Jenkins 教授的论文《中国是南部出口国的竞争威胁吗？》对目前众多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会给南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的文献作了讨论，指出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提出自己研究得出的关于中国出口增长对这些国家可能产生的静态和动态的影响。Mahvash Saeed Qureshi 和万广华教授的论文《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扩张：机遇还是威胁？》通过比较分析中印两国的贸易模式、出口产品结构和专业化发展情况，提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不同产业和产品方面面临来自这两个国家的竞争威胁，同时也指出，近年来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正在朝着科技密集和资本密集的方向发展。

本书的第四部分内容为“大国的角色：中国和印度的未来”，由三篇论文构成。Paola Subacchi 教授的论文《中国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做好准备了吗？》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经济在 21 世纪崛起的过程及其原因，指出中国的增长道路是廉价劳动力、市场规模、技术的迅速现代化和全球竞争的组合体。论文也指出了中国增长中的非均衡状态，尤其对消费和投资的非均衡、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非均衡、人口结构发展的非均衡等现象进行了分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专家李月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张斌的论文《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及其维持快速增长所面临的挑战》论述了中印两国经济如何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生产要素的配置分别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来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同时也指出这两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对中国来讲应该尽快发展其服务业，对印度来讲应该尽快发展其制造业。Timothy M. Shaw 等教授

的论文《21 世纪初的全球与(或)地区发展? 中国、印度和南非》通过一些新的视角,如新兴经济体与新兴工业化国家、落后国家与发展国家、新地方主义、资源冲突和新南—南关系等,考察目前的“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或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CIBS)与其他非洲国家的互动关系,推测这样的互动关系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新的国际关系或者新的南—南联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 BRICS/CIBS 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它们必将在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层面上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未来全球结构和全球治理形式的关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翻译和文字校对工作。对本书中的论文翻译做出贡献的有刘杰、赵剑治、郑川江、刘琨、范飞、耿邦昊、季新星、朱爱勇、蒋仕卿、汪汇、李倩,文字校对有章元、罗长远、张爽、田士超。当这些论文能够收集、翻译、出版时,我们首先应该感谢为在北京召开“全球经济增长的南部引擎——中国、印度、巴西及南非”学术讨论会而工作过的同事们。其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陆铭博士在会议组织和为这本书的出版进行联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需要特别感谢。最后,本书最终能够出版,离不开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子馨副总编的关心和责任编辑鲍雯妍的努力工作,我们尤其要表示我们的由衷谢意。

编 者

2007 年 7 月于复旦

目 录

中国的崛起：改革和开放的推进	(1)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视角	姚树洁 韦开蕾(3)
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成分分析法	宋立刚 盛誉(31)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	蔡昉(50)
中国、南非和 Lewis 模型	John Knight(64)
发展的经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73)
金融发展与中印经济增长：一些思考	Pranab Kumar Das Basudeb Guha-Khasnabis(75)
经济改革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支出：来自中国与印度的证据	张晏 Pinaki Chakraborty(98)
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趋同：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	吴延瑞(118)
全球增长和收入分配：中国、印度，世界的重塑者？	Maurizio Bussolo Rafael E. De Hoyos Denis Medvedev Dominique van der Mensbrugghe(132)
大国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成长	(165)
中国是南部出口国的竞争威胁吗？	Rhys Jenkins(167)
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扩张：机遇还是威胁？	Mahvash Saeed Qureshi 万广华(183)

大国的角色：中国和印度的未来 (217)

中国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做好准备了吗？

..... Paola Subacchi(219)

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及其维持快速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 李月芬 张斌(239)

21 世纪初的全球与(或)地区发展？中国、印度和南非

..... Timothy M. Shaw Andrew F. Cooper Agata Antkiewicz(265)

中国的崛起：
改革和开放的推进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视角

姚树洁* 韦开蕾**

一、引言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被广泛地研究,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并且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许多研究者在关注这两者的关系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Bhagwati (1994)提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及效率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实行出口推动还是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Bala-subramanyam 等(1996)证实,相对于进口替代国家(import substitution strategy,简称IS)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在那些依靠出口推动(export-push,简称EP)经济增长的国家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印两国都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因此这两国很有可能通过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缩小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科技、人力资本以及外部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Romer, 1986, 1987; Lucas, 1988),它不同于强调储蓄和投资的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也不同于强调技术进步的新经济增长模型(Solow, 1957)。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完全相一致,因为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Kreuger, 1975; Greenaway and Nam, 1988)。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以及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很多实证研究都关注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 Greenaway and Sapsford, 1994),或者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Chuang and Hsu, 2004; Lardy, 1995),又或者检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Yao, 2006)。虽然许多现有的文献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对于它通过何种机制对新兴工业化的经济增长过

* 姚树洁,英国诺丁翰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 韦开蕾,密德萨斯大学博士生。

程起作用却还未被充分研究。

为了充分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DI)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国内投资是产出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没能指出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来发展自己。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是生产过程中基本的要素投入方式,前者相对于后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加速了东道主国家采用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的进程;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总是能够带来东道主国家国内所不具有的新技术和专有技术。

通用技术是指能够影响全球经济体系的发明创新,最近的通用技术的例子包括计算机、因特网以及手机。每一项通用技术都能够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总生产率,但是任何国家想要充分发挥它的生产能力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工业化国家往往是采用通用技术的先行者,而它们的经验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

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国内投资的主要区别来源于跨国公司的经营动机,因为这些跨国公司都努力在东道主国家寻求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根据 Dunning 的兼容并包理论(*eclectic approach*) (Dunning, 1993),跨国公司到国外去投资一般需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比本土企业具有产权上的优势;第二,它们在使企业行为内生化方面有优势;第三,区位优势。因此,当跨国公司有能力整合以上三个优势时也就意味着它们在经营业绩上有能力超越本土对手。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本土企业必须通过“看中学”(learning by watching)的方式从外国竞争对手那里学习它们在管理和组织上面的优越表现。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最终使得本土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和配置资源,从而缩小实际产出与稳态生产可能性前沿之间的技术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国内投资的第二个区别在于它总是能够带来东道国国内所不具备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能够使东道国的生产可能性前沿达到新的水平,也就是说使得同样的资源能够达到更高的产出。当然,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比如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战略、人力资本的充分聚集、完善的基础设施等等。

中国是一个可以检验这些假设的理想范例,这是因为它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通过长时间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经历。这篇论文分为如下几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用来分析两个描述外商直接投资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假

设；第三部分提供了关于中国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背景信息；第四部分用涵盖 1979—2003 年整个改革阶段且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的经验数据来检验两个假设；第五部分则对这些假设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含义及建议。

二、FDI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假设

2005 年 6 月 15 日，欧盟贸易专员 Peter Mandelson 在布鲁塞尔发表了“欧盟是否有能力与中国竞争”的演讲，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与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关于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欧盟问题的谈判，他指出欧盟制造部门正面临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严峻挑战。20 年甚至 10 年以前，世界上最主要并且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盟——都无法确定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并且如此强有力地成为它们真正的竞争对手。然而今天，这种不确定变成了现实，而且世界格局似乎也将要发生变化，因为中国已经将 GDP 翻两番作为经济发展目标。

由于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并且本国的贸易赤字正在持续上升，美国、日本以及欧盟这些经济体的政治领导人开始指责中国不愿重新估算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行为。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对人民币实行了贬值政策，用来消除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币值的扭曲，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商品在全球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中国企业能够批量生产各种类型的工业品并以较低的价格卖到西方国家，而不是因为被低估的人民币币值。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在购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时能够受益，而生产者如果不提升产业链或者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竞争力的话，必将受到冲击。

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会威胁到西方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包括这两个国家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一些经济分析家认为，从 2004 年开始的全球油价飙升之所以没有引起全球经济倒退甚至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产自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的通胀压力。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只要发达国家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和印度之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威胁或者挑战，就意味着后者正在赶超前者。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这就是穷国和富国，或者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收敛趋同现象。罗默(1986, 1987)等人提出经济收敛能够用资本报酬递减法则来解释。由于富国相对于穷国而言拥有更高的人均资本拥有率，因此富国继续增加投资将会引起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所以跨国公司必然努力寻找更高的资本回报，

而具有较低人均资本拥有率的穷国显然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因为潜在的资本回报在这些穷国将会更高。跨国公司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也缩小了它们与发达国家在人均资本拥有率方面的差距。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赶超发达国家(Islam, 1995; Sala-I-Martin, 1996)。即便是对于中国和印度,如果它们不进行经济改革或不对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敞开国门,那么也不能赶超西方国家。换句话说,要赶超工业化国家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根据 Gregory Chow (2005)的主张,这些前提条件包括: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制度和市场的自由化、发明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

最新的增长理论都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教育和人力资本是工业化过程中“后进者”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看中学”(learning by watching)来模仿工业化国家所必需的最基本条件。同时,教育和人力资本也是创新和知识创造的最基本条件。与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成功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了教育从而积聚了人力资本(世界银行, 1993; Yao and Zhang, 2003)。

政府政策和市场自由化之类的制度因素同样是经济赶超的重要条件。在经济改革之前,虽然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采取了闭关锁国、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的政策,中国未能赶超西方国家。类似 1978 年以前的中国,印度在 1990 年之前也实施了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政策,从而使印度经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因此,市场自由化以及经济改革不管是对 1978 年以后的中国还是 1991 年以后的印度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个追赶条件是发明和采取新技术的能力。对于工业化的“后进者”,发明所有用于现代化的技术是不可能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反,后发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前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取那些发达国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明出的技术。这种现象在最近特别明显,因为最新、最通用的技术都在信息部门,而因特网和通讯技术能够很容易被模仿和采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迅速而深刻的影响。中印两国并没有发明所有的网络和通讯技术,但是它们巨大的市场规模使得两国的民众现在享受着世界上最优质和廉价的服务。即便是在非洲,手机和因特网也正在成为地区之间传递市场价格和信息的有效工具,而这些地区在原先往往是信息闭塞并且交通不畅的。

但是后来者如何才能获得不是由它们自己发明的技术?一种方式是通过直接进口技术,另外一种最普遍的方式是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Ethier and Markusen, 1996; Globerman, 1979)。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总是具有对外

投资的冲动,因为他们不仅想要确保他们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占有一定的市场比率,而且想要在东道主国家低本地制造产品从而提高资本报酬率,进而把他们产品的竞争力扩展到传统市场以外的新兴市场(Blomstrom and Sjöholm, 1999; Chen 等, 1995)。投资者的这些投资冲动形成了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对于东道主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是获取发达国家所掌握的技术的最有效和直接的方式,而这正是使得穷国和富国经济得以收敛的重要机制。因此从这方面讲,东道主国家的激励也形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只是经济开放这一“硬币”的两个方面,但是很少有经济学者研究这两者的差异。很多崇尚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指出,参与国际贸易使得各国在全球分工中能够专业化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最终,参与贸易使得双方能够互惠互利。对于穷国而言,出口和外汇收益是进口国外商品、服务甚至技术的必要条件。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虽然并不能改变一国的生产可能性前沿出口却是该国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条件。从更广范围来讲,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一国生产效率时所起的作用和出口并没有两样,因为它能够通过跨国公司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组织架构。对于那些由于国内缺乏资本而难以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弥补国内投资的不足。因此,外商直接投资被认为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能够通过引进本国所不具有的先进技术从而加速经济增长。虽然很多理论都发现出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毕竟还不能替代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如果考虑到以下情形,我们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假设中国有能力出口大量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到美国,然后用这些赚得的外汇购买美国生产的飞机和汽车,如果是这样的话,由于纺织品和服装只需要中国国内的技术就可以生产,中美的双边贸易难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量。但是,假如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比如通用、福特,或者飞机制造商波音,能够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它们的汽车和飞机,那么国内的企业将能够通过“看中学”(learning by watching)或者为它们提供零部件来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

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就是一个典型。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汽车工业技术基本上由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进口的生产技术所主宰。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就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并用于制造解放牌卡车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78年,工厂一直一成不变地生产这种型号的卡车。在其他汽车生产巨头意识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之前,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

的大众汽车公司几乎主宰了中国市场长达 10 多年。而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外汽车生产巨头都已经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合资公司,就连奔驰和宝马也开始设立生产线。通过设立合资企业,本地厂商能够模仿国外竞争对手的生产技术来生产属于自己的汽车型号或者提供零部件给国外厂商。毫无疑问,这样一来,外商直接投资不但能够提高国内厂商的生产效率而且还能推动中国的生产可能性前沿向世界最先进的水平靠拢。

让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其中一国是发达国家 A,另一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 B,两国生产技术都遵循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_{jt} = A_{jt} f(K_{jt}, L_{jt}) e^{g(z)} \quad (1)$$

上式中 Y 、 K 、 L 分别代表 GDP、资本和劳动力; j 和 t 分别代表国家(A, B)和时间; $g(z)$ 代表影响生产效率和生产可能性前沿的各种要素的函数,包括出口、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因素等等。因为 A 国比 B 国更加富裕并且拥有更高的人均资本拥有率 K/L , 所以只要 $\frac{\partial Y_{Bt}}{\partial K_{Bt}} > \frac{\partial Y_{At}}{\partial K_{At}}$ 成立 A 国倾向于在 B 国进行投资来最大化资本回报。

在这样的情形下,两国都将在资本的跨国转移中获利。A 国的收益在于它不仅能够最大化资本报酬率,而且还能够得到 B 国的市场。而 B 国的收益在于它在获取 A 国的技术的同时也能增加人均收入,从而缩小与 A 国之间的差距。

另外再假设两国都投资于各自的科学技术以提高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但是,由于 A 国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禀赋,因此它的创新能力就更加强大,从而在同样的投入水平下,相对于 B 国能够在更高的产出水平进行生产。此时,B 国要想缩小技术上面的差距只有通过吸收 A 国外商直接投资来进口技术。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可以由下面两个假设来描述:

假设 I: 假设 B 国的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高 B 国的生产效率。由于外国投资厂商拥有更加优秀的人力资本、管理和组织结构,使得它们往往是通用技术应用的先行者。从而国内本土企业能够通过“看中学”(learning by watching)学习国外竞争者的先进方面。此外,由于担心会在竞争中输给国外同行,它们往往更有动力使企业变得高效且有竞争力。

图 1 能很好地描述外商直接投资在 B 国生产技术提高上扮演的原动力角色。 PF_B 表示 B 国的生产函数。在一开始的稳定状态下,投入位于 X_0 , 此时没有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实际产出位于 Y_{d0} 。如果在此状态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或者 $\frac{\partial Y_B}{\partial FDI_B} > 0$, 那么实际的产